

凌志军文集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凌志军 著

很多人问我最喜欢自己的哪本

好回答。每一次写作都是牵肠挂肚
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当然这是
感。倘若平心而论，哪能没有高
巧，我想最为洒脱开放，也能代表
的，应当是《变化》。在这之前，
型的时政文字，《交锋》和《呼

塞满主流报刊上的人云亦云、

全没有独立精神的文章，不能接受，想要另辟新
途，所以这些文字的品格与流行的时政文章截然
不同。在这之后的《追随智慧》、《联想风
云》、《成长》、《中国的新革命》，是在试图
开拓当代中国商业史的写作空间，从政治和文化
的立场来叙述经济技术，又以大历史的眼光来衡
量瞬间。可是要说在写作方面更进一步，自《变
化》之后，便觉得非常困难。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I253.3/8

:2

2008

凌志军文集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凌志军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7

(凌志军文集)

ISBN 978 - 7 - 216 - 05556 - 7

I. 历…

II. 凌…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②农村人民公社—研究—中国—1958—1984

IV. I25 F321.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7427 号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凌志军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3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275 千字
版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556 - 7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6
插页:3
印次: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谨以此书——
献给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纪念这个时代所有的开拓者
祭奠这个时代所有的牺牲者
呼唤这个时代所有的后继者



凌志军，祖籍广东，1953年生于上海，长在北京。十五岁到工厂做工，十六岁做农民，十九岁当兵，二十五岁成为新华社记者。三十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凌志军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当代中国记者的“标杆”。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他拥有广泛的读者。他在过去十多年间连续出版九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 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新革命》，被境内外媒体和研究机构评为当年“值得记忆的好书”、“年度商业书”、“最佳商业图书”。
- 2005年出版的《联想风云》，入选当年“最佳风云榜”，并获得“2005年度北京地区最佳版权输出图书奖”。
- 2003年出版的《变化》，被中国大陆媒体评为“年度图书”，同时在台湾获得“开卷好书奖”。
- 2000年出版的《追随智慧》，被媒体评为当年“最佳纪实文学”。
- 1998年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引起轰动，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成为当年“中国第一畅销书”。
- 1996年出版的《历史不再徘徊》，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总序

收在这里的文字，叙述了1978年至今我们国家的变化和冲突，牵涉到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巨细交织，贵贱混杂，都是真人真事，没有虚构。我虽掺杂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但也是眼见耳闻，有感而发。原是九个单行本，陆续印行，现在依原版集中重排，共九卷，没有增删，只是顺序稍有更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交锋》和《呼喊》这两本，是和我的同事马立诚合著。他设计了《交锋》全书的构架，并且撰写了其中第一、第二部分，因此他是这本书的第一作者。他也是《呼喊》卷三和卷四的撰写者。这两本书当时影响很大，争议也很大，这都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如果没有马立诚，就不会有这两本书。

很多人问我最喜欢自己的哪本书，这问题不好回答。每一次写作都是牵肠挂肚。作品好比儿女，手心手背都是肉。当然这是夹杂了个人情感，倘若平心而论，哪能没有高下呢！单说技巧，我想最为洒脱开放、也能代表我的写作追求的，应当是《变化》。在这之前，《沉浮》属于典型的时政文字，《交锋》和《呼喊》也是。我对塞满主流报刊上的、人云亦云、套话连篇、完全没有独立精神的文章，不能接受，想要另辟新途，所以这些文字的品格与流行的时政文章截然不同。在这之后的《追随智慧》、《联想风云》、《成长》、《中国的新革命》，是在试图开拓当代中国商业史的写作空间，从政治和文化的立场来叙述经济技术，又以大历史的眼光来衡量瞬间。可是要说在写作方面更进一步，自《变化》之后，便觉得非常困难。

书 总

《历史不再徘徊》有些特别。有人认为它是我的“巅峰之作”，其实说它是我“处女作”更接近事实。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我现在仍很怀念二十年前写这本书的情形，尽管精神上备觉沉重，可是心境特别纯粹，因之能够淋漓挥洒，话也说得痛快。我为这本书耗时七年，终于完成的那个下午，我离开都市的喧嚣，来到城郊一处荒野的山坡，盘腿坐在一棵老松树下，品味着摆脱压抑的喜悦，心里有某种激情沸腾起来。那一天天空特别清澈，阳光渐渐柔和，从背后照过来，经过我面前的草地伸向远方。我能够看到天地之间的那条线，一条金色的地平线，发出迷人的光彩。我感觉到未来之路清晰可见，伸出手去可以触摸。我对自己说：“你知道该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了。”那时候我已年过四十，觉悟得太晚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当时的选择。对我来说，《历史不再徘徊》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把我引向一片新大陆。

这些年公开的舆论总说我是作家，但我更愿意别人当我是记者。不是因为记者比作家好，而是因为记者只不过是一个职业，进了这圈子的人，不论贤愚优劣，都叫记者。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这是事实，无关好恶。

我从1978年开始做记者，迄今三十年。这一过程刚好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重合在一起。当初立志于斯，满腔热血，信奉秉笔直书，言无不尽。好像新闻学的教科书也是这样教我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冲右突，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既奋勇，又盲目。后来经历种种希望和失望、欢乐与悲伤，这才知道，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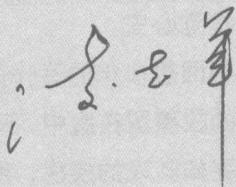


个圈子里充满了名利的诱惑，也有绵绵不绝的压力、磨难和寂寞。想要守住自己崇奉的信念和品格，不可稍有更动，实在不易。我对那些冠冕堂皇的褒贬并不介意，但是来自民间的喜怒哀乐却能激起我的写作冲动。我想告诉读者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历史上一切民族的重大进步都有一个共同处，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认真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下来。我一页一页地写，一本一本地出版。我想用自己的写作证明，记者是可以不拘一格的，记者是可以拥有独立精神的，记者是可以不用追随权贵的，记者是可以说真话的，记者是对公众负有责任负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个行当是可以受人尊重的。记者不仅是瞬间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现在我可以说，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做的事。我在写作中感受着无穷的激情、智慧和快乐，也因为尽了力而稍觉心安。

然则回想多年的写作体验，并不能让我满足。它给我留下太多的遗憾。我有太多的故事留在腹中，不能吐出；有太多的话已经吐出来，又不得不咽回去。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今生是否还能拿起笔来。有时候我设想，如果有来世，我是不是还会做记者？回答是：会！我祈祷，到那时候，能够弥补今生的遗憾！

我要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愿意把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再行出版。我要感谢在过去岁月里为印行我的书而殚精竭虑、甚至遭遇巨大压力的所有编者、出版社和

经销商。我要感谢我在人民日报社的同事们，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富有激情和灵感的一段时光。我要感谢那些对我持有强烈批判立场的人，他们让我学会了倾听、理解和宽容。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赵晓东，她始终都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读者和不留姓名的编校者。在我深陷压力之日，是她让我坚强；在我面对赞美之时，是她让我从容。我要感谢所有那些支持我、喜欢我、接受我和批评我的读者们。在过去这些年里，因为有了他们，我的生命才变得更精彩、向上、充满阳光。他们是我能够坚持到今天的力量源泉。现在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向读者送上我的真诚和我的书，诚惶诚恐地等待读者的评判。对我来说，我的上帝不是任何一个有权有钱有势力的人。我的上帝是读者。永远都是！



2008年4月20日



目 录

序幕 千年一梦 /001

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 /009

小岗寒夜——二十位农民的契约文书是否赝品——中南海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争论——农村两亿人食不果腹——无力回天的陈庭元终于大彻大悟

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 /030

合作化中的“大同梦”——邓子恢被批判，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包产到户”的首次出现——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诞生——“六十条”：人民公社第一个成熟的制度——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包产到户”使四百万人受牵连

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 /074

五万个人民公社为城里人提供了多少食物——几百万农民乞讨为生——“三年决战”与安徽“六条”——“真理标准”讨论对人民公社的影响——“责任制”：一个持续时间最长含义变化最多的概念——凤阳的“四级所有”

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 /095

1978年12月13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与“新六十条”在同

一天通过——省委书记的迂回战术——中国的改革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第五章 从昔阳到凤阳 /113

“张浩事件”——陈永贵的辉煌与黯淡——“要吃米，找万里”——“包产到组”：向人民公社制度的挑战——尊重农民的选择

第六章 相持不下的日子里 /148

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三个不怕死的县委书记——张世贤和迟世光为何未能成为英雄——人民公社最后的意识形态屏障——人民公社在九个贫困省区开始瓦解

第七章 公社精神的破产 /177

昔阳的欺世盗名昭揭于众——经济问题缘何演变成政治问题——“文化大革命”与人民公社制度——“学大寨”：号令六亿农民的政治旗帜黯然失色——公社精神永远不会再放光彩

第八章 余韵缭绕 /209

“切三刀”：关于“包产到户”的折中方案——秋后算账：人民公社不如包产到组，包产到组不如包产到户——1982年第一天，中共中央再次颁布关于农村的新文件——人民公社失败原因的种种分析——人民公社最后的解体

后记 /242

主要参考书目 /244

再版后记 /247

序幕 千年一梦

我们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世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乃由一个最庞大的政党所创造。它包含了有史以来最为美好的理想,却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至少三千万人直接死于饥饿和饥饿所造成各种疾病,另外三千万人则由于父母的营养不良未能诞生。它是 20 世纪我们国家战胜饥荒的最重要的史篇,其兴起至结束的全部过程为二十七年,也即 1958 年至 1984 年,但它的序幕已经持续了二千八百年。

这是一个“大同王国”的总失败的记录。

人民公社的全部历史与“大同”概念联系在一起,这在它的诞生之际已有明显征兆。1958 年盛夏,我们的国家就好像是一座深陷理想狂热之中的圣地,这种狂热气氛的中心则为河北省徐水县。8 月 4 日,毛泽东的专列开进这个地方,万民景仰,遂将梦想当做事实。第二天徐水即宣布了向共产主义的“进军”。二百四十八个农业合作社合并而为一个人民公社,自耕农民立即成为公社社员。这一情节后来被载于史册,作为人民公社历史的开端,广为转述。但是,其中一个细节却为大多数史家忽视:当日由京城赴徐水主持人民公社的开创者们,有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若干官员,他们奉命在身边携有《大同书》一卷,用做公社思想的指导。

这一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背后有着大历史的逻辑。

“大同”这一概念的最早出现,大约是在《礼记》中。后来则有儒家标榜“天下为公”,也是继承这一典型表述、与“天下为家”的“小康”境界相对照。这样看来,这一思想的渊源,在我们的国家中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不过,以“大同”为宗旨全面设计未来社会,当以这本《大同书》为代表。

此书系近代思想家康有为所作。他在 1884 年执笔，1902 年杀青，成书十部。各部名录如下：

- 甲部：入世界观众苦
- 乙部：去国界合大地
- 丙部：去级界平民族
- 丁部：去种界同人类
- 戊部：去形界保独立
- 己部：去家界为天民
- 庚部：去产界公生业
- 辛部：去乱界治太平
- 壬部：去类界爱众生
- 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我们由这里可对作者的思想轮廓以及用心良苦有一个大体印象。如此彻底的革旧鼎新之论，在当日实为惊世骇俗。书成之后，作者十年秘不示众，生前只将其中甲乙两部公开印行，时为 1913 年。全书直到 1935 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时作者已经去世八年。又二十三年以后共产党的官员们携带在身边的，也是这一版本。

在党的领袖毛泽东心中，《大同书》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也有着事实方面的根据。毛泽东之阅读康有为的《大同书》，至少可以追溯到 1917 年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这一年他有一信寄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员黎锦熙，其中即热烈地响应“大同”。他说到孔子以“太平世”为其所望，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还说“大同”之世，也是我辈所望。这种将历史的进步分为三世的方法，正是康有为《大同书》所依据的基本逻辑。然而更加要紧的事实在于，毛泽东的心中自此便时时萦绕着对于新社会的期望。所以他先是策划“工读同志会”，邀几朋友于岳麓山中从事半耕半读，继之又希望能够在山中建立一个功能及制度更加齐备的“新村”。他写道：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场，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

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他的这一“新村”计划，发表在1919年第十二期《湖南教育月刊》，题为《学生之工作》。毛泽东时为二十六岁。将这一计划与《大同书》加以对照，可知两者的关系至为清晰。比如康有为称其“大同”乃是无邦国，毛泽东则说国家与教会、资本家、君主一样，“为天下之恶魔”。康有为指斥家庭有不可避免之公害，必去之方可入“大同”，毛泽东的“新社会”则以“合并若干家庭”为前提。康有为又主张无产界、均贫富。贫者可得公政府恤养，病者可在公医院就医，农家居有公室，食有公厨，好学问者有公共图书可读，欲成才者有公共学校可进，想休闲娱乐者则有公园可去。毛泽东的计划是公共银行、公共消费社、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场、公共图书馆、公共剧院和公园。这种对照固然失之机械，但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来说，并非不可理解。

我们不能同意一种说法，即认为二十多岁的毛泽东尚处不成熟的阶段，所以他在那个时候的想法不能代表日后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作为。实际上，所有历史伟人虽然具有不同特征，早熟却是他们共同的情形。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一个二十九岁，一个二十七岁，但是这一部书对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犹如《圣经》对于基督教徒。无数人为之奋斗，直至耄耋老矣，依然信守不渝。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共产主义伟人身上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毕生的思想轨迹，几乎全部可以在他三十岁以前的生活中找到渊源。比如他认定自己在1920年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他在那一年里所阅读过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实只有三部，即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以三本书即能决定一个人毕生的世界观，已经令人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事：他从这三本书中所领会到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有四个字，即“阶级斗争”。他此时不过二十七岁，可是，就是这四个字成为他毕生所求，至死不曾改变，甚至可以凭此使我们的国家在以后六十年里地覆天翻。

毛泽东在他去世的前夕曾说自己只不过做了两件事情，其一是打垮了蒋介石和建立了新中国，其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可以看做是他给自己毕生所为的一个总结。将这两件事情合起来看，其实就只有阶级斗争一个要旨。但是，我们也不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毛泽东穷其毕生精力仅搞了阶级斗争。实际上，他确曾对于“大同世界”寄以无限期望，并且以自己的热情、胆魄和权力将这个期望付诸实施。这在1949年他建立政权之时，便已留下明确迹象。他说：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到达大同的道路。”这表明他并不否认将“大同”作为理想的目标，只是认为共产党较之康有为的高明处，在于可以开辟到达目标的道路。这道路便是他在二十七岁时即已认定的“阶级斗争”。此后若干年间，毛泽东已六十多岁，自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对于康有为的著作仍是“经常要看”。到了1958年他在发动人民公社的时候，又宣布“前人乌托邦的理想，将在我们的手中实现”。同样的意思康有为在六十年前说“孔子之太平世，佛之莲花世界，达尔文之乌托邦，实境而非空想焉”的时候，即已有过清晰的表述。

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民公社的故事虽然发生在50年代至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它的序幕其实在康有为写作《大同书》的时候就已经拉开。当然，《大同书》给予我们民族优秀分子的影响并不仅止于毛泽东一人。当日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无不为之感动，这些人甚至还能组成一个十七人的“工读互助团”来加以实际体验，只是实行三月，即告解散。

然而康有为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个“乌托邦”的思想家。比如“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创造者——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就早于康有为四百年来到这个世界。《乌托邦》正是他的成名之作，他在那里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国家，其想象是如此丰富大胆，叙述又是如此娓娓动听，以致这一概念就永久地成为后人心中理想王国的代名词。作者也就在当时以及后来的伟大学者中间占有了无可争议的崇高位置。

在幻想他的“乌托邦”的时候，莫尔充满了严肃的时代精神。他刻薄地指责教士的腐败、贵族的淫逸、穷人的悲惨处境以及世间种种不平事，其激烈甚至达到为罪犯开脱的程度。他指出个人的犯罪行为大多是由于整个社会安排不当。接着，莫尔开始描述一个理想国家。他的“乌托邦”在地理上有着具体位置，坐落在旅行家韦斯普奇可能达到而其他人从未见过的某个地方。首都的名字叫做“阿马罗特”。这座城市没有狭窄坑洼不平坦的街道，也无低矮肮脏的建筑。人民讲究卫生，厌恶战争，全都希望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统治他们的国家。其治理国家的首要原则乃是废除财产私有和建立公有制度，这是实现平等和消灭犯罪的最有效的办法。利益的分配也要遵循平等原则，这不仅包括物质的方面，还有科学和艺术。在这个美好的国度中，人民的道德水准已经十分崇高，不是以欲望而是以蔑视欲望为基本的动力。在一个没有个人财产的地方，每一个人便都热心于公共利益。所有的人都明白，只要努力使公家仓库里面装满财富，个人也就什么都不会缺少。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贫穷，根本不使用金钱，宁愿要铁也不会要金银，

只有愚蠢顽固之徒才会颂扬金钱的价值。金钱乃是“万恶之源”，最彻底地使其名誉扫地，便会使人民摆脱畏惧、焦虑、劳累和日夜戒备。所以“乌托邦”的人民只是把金银用来制作最低级的器皿，或者做成罪犯的镣铐以象征丑恶和耻辱。服装的特征是俭朴而经久耐穿，因为奇装异服乃是在人民中引起分裂的根源。当然任何装饰也会遭到蔑视，假如有一位远方的使者来到这个国家，居然身着华丽的礼服并且饰以宝石金链，人们就会将其看做奴隶、小丑、傻瓜或者挂着一串玩具的孩子，因为在这里只有这些人才会具有这样的装扮。每一个人都在公共食堂里面吃饭。女人坐在一侧而男人坐在另外一侧。午餐丰盛鲜美，耳畔音乐荡漾，不过，这一切要在老人们做过一番道德的训示之后，才能开始。当然，这里没有光吃不干的人，男女各自从事适宜的工作，没有乞丐，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人们各尽所能，国家有足够物质来满足民众需求。国家运行的要旨乃是中央集权，而中央的政治权力又都集中于一人之手。此人大权在握，纲常独断，但他拥有崇高的道德准则，可以把专制精神与完美制度融为一体。这个国家的美好和具有理性，还在于它应当控制和监督家庭。婚姻应受理智的支配，并需有元老院的准许，不须凭借感情或者金钱势力的依托。乌托邦人民的普遍的价值标准，是认为将公众利益置于个人私事之上乃是一种爱国表现。所以，一个人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就是获得了最高形式的快乐。国家将公开授予这样的人以崇高荣誉。他们的雕像将树立在广场中心永资纪念，其他人连同他们的后代则努力向英雄学习。

在我们了解了人民公社的故事之后，就会发现莫尔超越他的同时代人好几个世纪。他所描述过的许多原则竟然真的会在 20 世纪的一个国家中出现。他的《乌托邦》以拉丁文写就，三次译成英文，还译成其他多种文字，成为世人共知的话题。现在看来这的确是一个预测未来的典范。

但是，莫尔虽然创造了“乌托邦”的概念，却仍然不是阐述“乌托邦”思想的第一个人。在他之前，“乌托邦”思想的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8 世纪古代希伯来的先知者们。有阿莫斯，这个草原上的牧人和无花果树的剪修者，同时又是一个严峻的道德家，他宣告人民有罪，热切呼唤着一个充满公平和秩序井然的社会。这个社会对个人和国家施以全面改造，以重建集体道德。有霍齐亚，他是一个教士，却热衷预言人世，时刻想象着人类精神上的净化会呈现一幅新的画卷：正直与公道，爱情与忠诚是新时代的福音。战争将告结束，弓剑束之高阁，大地奉献着丰硕的果实。有艾赛亚，他出身低微，可能是一个山野之民。所以他的理想王国充满了大自然的阳光：沙漠将欢呼，像玫瑰一样怒放，干裂的土地变成了

池塘，豺狼与山羊同居，牛犊和小熊共眠，狮子和牛一样地吃草。有杰里迈亚，他相信由于个人和社会的革新，理想的国家定会实现。这是因为，每一个人为了参加一项伟大的共同事业而慷慨激奋的时候，全社会也必形成一致行动。有伊齐基尔，他注意到在一切伟大事业中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所以他相信他的使命就是教育国人像社团成员那样生活在一起。有艾赛亚第二，他的预言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他认为“为人民服务”乃是耶和华向各民族发出的最高号召。这些思想者的预言虽然还未提供鲜明的社会轮廓，我们却已经可以看到其中“乌托邦”思想的渊源。

在此之后，“乌托邦”思想家的力量开始体现在他们所创造的国家中，比如耶稣的“天国”，奥古斯丁的“上帝城”，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5世纪之前。然后“乌托邦”的思想脉络中断了大约一千年。直到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诞生，历史又顽强地延续下来。莫尔的思想明显地具有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精神，后来者又无不深受莫尔的影响。这些人当中，在17世纪有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哈林顿的“大洋国”，18世纪有一大群空想社会主义者，19世纪有赫茨卡的“自由之乡”，20世纪有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这样，到了康有为撰写《大同书》的时候，人类的“大同”之梦已经持续了至少二千八百年。

“乌托邦”的思想家们有着各自独特的想象力，尽管如此，在某些关乎宗旨的重要方面，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惊人的一致，而且居然能够延续二千八百年之久而无明显变化。我们必须将它们概括地加以叙述，因为它们在我们将要讲述的人民公社的故事当中，几乎全部再现：

- 一、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消灭贫富差别，实行财产均衡。
- 二、道德至上。精神为施政的基础。只要社会具有坚强的意志，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 三、金钱和私欲一样，都是万恶之源。
- 四、社会之繁荣在于共同生产和共同消费，而不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
- 五、除培根外，所有人都认为家庭是人类通向“大同”的障碍，所以应当被废除或者受到控制。
- 六、公民应为国家的利益牺牲个人。

七、除傅立叶外，所有人都主张抑制人的天性。不认为社会的变革须从个人开始，更不认为由个人本性发展而成的社会力量的巨大，只设想人应当是什么样子。更将个人的特性与团体的特性看做是一回事。

八、由社会最优秀的分子治理国家而百姓各司其职。

九、社会应对精神环境负责。教育是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的有效手段。其首要的目标是向公民灌输纯洁的精神。

十、社会的进步乃是人的意志和计划的结果。可以预先精确地制定出一套具有完整秩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案，由同时代的人民去付诸实现。

对于这些杰出的思想家们来说，1835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英国人，罗伯特·欧文，在这一年里开始把这个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梦想称为“社会主义”。这一名称也就成了未来一个世纪一场世界性运动的标志。当然，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欧文看做是一个“空想家”，以与他们自己的言行作出区别。然而他们又全都不会否认这些“空想”乃是他们思想的渊源。其中以考茨基的表述最为直截了当。他说：“现代社会主义始于《乌托邦》。”

平情来论，在所有“乌托邦”思想家中，对于我们国家精神最具影响力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预言。这一预言家的阵营里面，几乎全是法国人，而且全都诞生在18世纪。包括摩莱里、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和卡贝。不过，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最具震撼力量的却是欧文。此人出身于手工业工人的家庭，天赋和不懈的进取精神使他成为一个厂长，并拥有工厂的部分股权，也即成为一个共产党所说的资本家。然而他却热衷于技术改造和为他的工人建造优良宿舍。他还是工团主义的倡导者，并且推动英国创立了第一个《工厂法》。他谋求人类的“最大幸福”，其思想核心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是在最大的实际可行的范围里，为每一个人创造幸福，而个人的幸福与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这些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一个务实的改良主义者和一个“乌托邦”思想家。但是最重要的，他是第一个试图将“乌托邦”的种种幻想付诸行动的人。他的“乌托邦”被命名为“团结合作村”，建立在苏格兰的奥比斯敦和北美的印地安那州。村宅呈四方形状，里面公共宿舍、公共食堂、公立学校、公共图书馆一应俱全，还有花园、马厩和洗衣房。人们生活其中，亦农亦工，像兄弟一样团结合作。这位伟大的幻想者天天想着将他的“四方形”的典范延伸开来，组成一个拥有千万“四方形”的